

##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张民服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关键词:**明代; 人口分布; 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3-0027-07

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共同体,它们始终处于永不停息的矛盾运动中,并与人口发展的历史相始终。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口分布的格局,人口分布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本文拟就明代的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有明一代,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原因,在人口分布上亦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从地域上看,江浙、湖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数量最多,山东、山西、北直隶、陕西、河南以及广东、四川等省位居其次,而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数量最少。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人口分布亦出现一些变化。有的省区在明前期人口数量较多,位次靠前,至中后期则位次下降;而有些省区在前期位次靠后,至中后期则位次前移。兹列表如下:

明代人口分布表

| 位次 | 明代前期(洪武二十六年) |          | 明代中期(弘治十五年) |          | 明代后期(崇祯三年) |          |
|----|--------------|----------|-------------|----------|------------|----------|
|    | 地区           | 人口数量     | 地区          | 人口数量     | 地区         | 人口数量     |
| 1  | 南直隶          | 11918974 | 南直隶         | 18490442 | 南直隶        | 30945410 |
| 2  | 浙江           | 10784567 | 浙江          | 15838504 | 浙江         | 24857404 |
| 3  | 江西           | 9062481  | 江西          | 13309403 | 江西         | 20241551 |
| 4  | 山东           | 5959876  | 湖广          | 9337001  | 湖广         | 16878227 |
| 5  | 湖广           | 5803660  | 山东          | 8883960  | 福建         | 10878056 |
| 6  | 山西           | 5083127  | 山西          | 7885684  | 北直隶        | 10780403 |
| 7  | 福建           | 4189806  | 福建          | 6499835  | 山东         | 10667390 |
| 8  | 广东           | 3242932  | 北直隶         | 6228281  | 山西         | 9991095  |

收稿日期:2005-11-05

作者简介:张民服(1954-),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

|    |    |          |      |           |    |           |
|----|----|----------|------|-----------|----|-----------|
| 9  | 陕西 | 2869569  | 陕西   | 5189118   | 河南 | 9559693   |
| 10 | 北平 | 2648595  | 河南   | 4980398   | 陕西 | 8465198   |
| 11 | 河南 | 2165542  | 广东   | 4508587   | 广东 | 6635304   |
| 12 | 四川 | 1672778  | 四川   | 3277591   | 四川 | 5346854   |
| 13 | 广西 | 1585263  | 广西   | 2437285   | 广西 | 3586961   |
| 14 | 西藏 | 1000000  | 贵州   | 1272103   | 贵州 | 2128978   |
| 15 | 贵州 | 940000   | 西藏   | 1000000   | 云南 | 1451225   |
| 16 | 云南 | 709270   | 云南   | 986085    | 西藏 | 1000000   |
| 17 |    |          | 奴儿干  | 622901    |    |           |
| 18 |    |          | 西北六卫 | 49832     |    |           |
|    | 全国 | 69636440 | 全国   | 110797010 | 全国 | 173413749 |

注:表中数字,是以万历《大明会典》、《明史》、《明实录》、《后湖志》等史料的记载,并参考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综合计算得出。

之所以选择洪武二十六年(1393)、弘治十五年(1502)和崇祯三年(1630)作为明代前、中、后期3个代表性年限,是基于以下考虑:从制度上看,经过开国后20多年的努力,洪武二十六年时明王朝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户籍管理和户口调查制度,因此其户口数字相对比较完整。从经济上看,全国的荒地开垦和经济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基本完成,人口发展处在较为稳定的“常态”阶段;从移民运动上看,至洪武二十六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基本告一段落,明初的人口分布格局至此基本形成。从史料记载上看,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较之明初其它年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从弘治十五年来讲,从时间上看,弘治十五年处于整个明王朝的中间年代,更能代表明代“中期”的人口分布情况;明孝宗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令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努力匡救正统以来的政治积弊,使得弘治一朝政治相对清平,朝内没有较大的政治纷争,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农民起义也较少发生,被称为“弘治中兴”。因此其人口发展也相对稳定,较之其它年份更接近于“常态”。从史料上看,关于弘治十五年的户口记载数据比较多,便于在讨论时进行对比分析。

从崇祯三年来讲,由于受灾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能已经弥补了人口损失,消除了灾害带来的人口影响;而崇祯三年以后,中国北方进入了一个灾害和战争频发的时期,人口大量死亡,数字变化较快,又处于非常态的发展阶段;另外,该年距离明朝灭亡的时间较近,从理论上说更能反映明代后期的人口分布情况。

## 二

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定限度的人口数量及密度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提高,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使社会的劳动分工更加细密,交换更加频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当人口密度过大时,会导致资源压力的加剧,由此产生各种社会内部矛盾和摩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明代的人口分布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大体如下:

第一,人口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布局和南北方生产经营方式的不同。在明朝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特产,明人王士性对此描述说:“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硃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羸、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榷楠大木。江南包工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sup>[1]</sup>(卷1)在古代社会,各地的社会经济大致是依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依托于资源的经济布局。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逐渐提高,明中期以后,这种经济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南地区与湖广等相关地区在经济上形成了明显的分工与互补。明中叶以后,湖广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成为天下的谷仓。宋代以降“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生产局面,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太湖流域从长期以来的以粮食生产为主变为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产量日渐不足。宋元时期苏湖等地“膏腴千里,国之仓庾”,曾是大量粮食外销之地,“若夫两浙之地,苏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sup>[2]</sup>(卷21,《上赵丞相》)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太湖流域已经大量从湖广地区输入粮食,万历时,“吴中不熟,全恃湖广、江西。”<sup>[3]</sup>(卷3)至明末,整个东南“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sup>[4]</sup>(卷10)此外,岭南一带不少地方也放弃了粮食种植,成为热带水果的主要产地。如“广州凡矾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sup>[5]</sup>(P65)区域经济的分工格局日益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湖广、广东等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在明代中、后期的大幅度增长,使这些地区得到开发。据前表所列,明前期湖广地区的人口数量仅为5803660,居全国第5位,到明后期猛增到16878227,跃居全国第4。人口密度更从前期的13人/平方公里,增加到后期的38.4人/平方公里;广东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也有较大增长。这些地区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一旦与规模适宜的人口结合起来,就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

明代人口分布对南北方生产经营方式的不同亦有相当影响。一个地区采用何种生产经营方式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的,从自然方面讲,如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水利因素、资源因素等;从社会方面讲,如当地的习俗、文化观念、长期形成的生产习惯等,都会对生产经营方式造成影响。此外,人口分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前文图表中可以看出,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区域是长江中下游的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地区,北方的山东、山西、北直隶、陕西、河南和南方的福建、广东属于人口较密集区,广西和西南的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属于人口稀疏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对生产经营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以农业为例,太湖流域堪称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人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发展综合经济。例如,在粮食生产上加大劳动力投入,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选用优良品种,充分发挥地力,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苏州一带,水稻品种已达数十个之多,其中不少为高产早熟,“红莲稻,五月种,九月收,芝红粒大,有早晚二种。”“六十日稻,四月种,六月熟,米小色白,迟者八十日熟,又名早红莲,又名救公饥。”“早稻,即占城稻,……至八月熟。刈后若频得雨,往往再生,所谓再熟稻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sup>[6]</sup>(P178-179)再如,将部分劳动力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上。苏、湖、杭、嘉四府之地适宜植桑养蚕,故种植了大量桑树,苏州“平原旷野之间,桑麻交错,高者无隙地,下者无闲田”。<sup>[7]</sup>(卷7,《民风》)湖州“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sup>[8]</sup>杭州“春来遍地是桑麻。”<sup>[9]</sup>(P15)嘉兴“桑林稼垌,四望无际”。<sup>[10]</sup>(卷52,《崇德县》)棉花自传入我国后,迅速在南北各地推广,明中期以后,“乃遍布于天下”,其中松江府种植最多,“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种植之广,与秬稻等。”<sup>[11]</sup>这一时期,江浙一带还大量种植了油菜子、乌桕、桐等油料作物。<sup>[12]</sup>(卷38)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则种植了竹木、茶、苎麻等经济作物。<sup>[13]</sup>(卷32《土产》)另外,当地人民还利用湖泊水塘众多的优势发展水产养殖业。

与江浙地区相比,除自然条件的差异外,北方地区还因其人口相对稀少而生产经营方式有所不同。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区域,历经明前期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中期以后不少地方社会经济日渐繁荣起来。但由于地广人稀,缺乏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许多地方还实行着粗放式经营。据史书记载,万历年间,山东六府“大抵地广民稀,而迤东海上尤多抛荒”;“第有司安循常而惮改作,居民席世业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主籍,原无抛弃,田皆耕锄,何曾荒芜,而不知东人之习为惰农业已久,即所谓主籍、耕锄者,悉凶莽裂裂,而与荒芜正等耳。”<sup>[14]</sup>(卷435,《垦田东省疏》)河南则是“其土甚广,以二亩三亩作一亩,名为大亩,二百四十弓为小亩。地旷人稀,真情农也。”<sup>[11]</sup>(卷3)吴江人袁黄时任北直隶顺天府宝坻县令,他看到当地生产落后、经营粗放、习俗懒惰的局面,深有感触,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遂写了一部《宝坻劝农书》,将南方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介绍过来,要求当地农民“照江南之例”从事生产。时人策衡则概括谈了北方贫瘠的情况:“若夫齐鲁宋卫秦晋燕赵之墟,古之膏腴,今为瘠乡,民情土荒,以致于此。”因而建议北方应效法江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加大生产投入,兴修水利,增加人力,使北方“如江南无三尺之情农,无尺寸之弃地”,改变生产落后局面。<sup>[15]</sup>(卷36,引策衡奏疏)谢肇淛在对南北农业经营作出对比后指出:北人“多畜田,然碗薄寡人,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每见贫皂村民,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sup>[16]</sup>(卷4)所以,北方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和自然条件较差,成为生产经营方式粗放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人口分布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江南等人口过剩的地区,人口压力的增大和土地资源的紧张,迫使人们在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上开辟新的领域,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物质需求的增长,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明中期以后,不仅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从以粮食为主转为以经济作物为主,而且其他地方也普遍种植经济作物。种植棉花的土地遍及南北各个地区,“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盖百倍焉”。<sup>[17]</sup>明代农学家徐光启谈到棉花时也指出:“此种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矣。”<sup>[12]</sup>(卷35,《木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中后期河南种植棉花的地区已达60多个州县,<sup>[18]</sup>(P32)成为全国主要的产棉地区。种植烟草的地区也很广泛,南方的福建、浙江、广西,北方的河南、山东等地都种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为之一变。

许多手工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手工业有棉布加工业、丝织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踹布业、草编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漆器加工业、珠宝制作业等部门。又如杭州府的锡箔制作业,据明人记载:“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造者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远自京师抵列郡,皆取给。”<sup>[19]</sup>(卷949,《杭州府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门类之多,规模之大,发展水平之高,令人惊叹。<sup>[20]</sup>(第2-6章)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前述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手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大都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在东南一些地方,甚至整个地区都转向了商品生产,“(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船舳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sup>[21]</sup>而且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从事商品生产,“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蓄好殖,以故富庶。”<sup>[22]</sup>(卷4)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前往江南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的商人云集。如松江和嘉定所属的枫泾镇、朱泾镇、新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中心和棉花集散地。吴伟业描绘江南棉花市场时云:“眼见当初万历年,陈花富产积如山,福州青林乌言价,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sup>[23]</sup>(卷10,《木棉吟》)明代中后期,河南棉花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亦很高,棉农除满足自身需要及供应本地棉纺织业外,还将大批原棉输往江南,供应松江、苏州等地区的棉纺织业,成为全国主要的原棉输出地。徐光启曾指出:“今北土之吉贝(棉花)贱而布

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sup>[12]</sup>(卷35,《木棉》)万历时人钟化民也说,中州地区所产棉花虽然数量很大,却“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sup>[17]</sup>杭嘉湖地区出产的丝织品远销各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来,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sup>[24]</sup>(下篇)乌青镇虽是江南的一个小小市镇,但它的丝绸贸易却是通向全国,近则“销内地机户,杭、绍、盛泽各邦”,<sup>[25]</sup>(卷21)远则闽粤等地。除了前面提到的粮食和棉花、丝绸以外,布匹、染料、陶瓷、茶叶等产品都被商人转运全国各地进行销售。商人的足迹迈向了更遥远的区域和更广阔的市场,如徽商,“走吴、越、蜀、闽、粤、燕、齐之郊,甚者溯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遍宇内。”<sup>[26]</sup>(卷1)晋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sup>[27]</sup>(卷4,《明故王显墓志铭》)洞庭商人“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sup>[28]</sup>(卷3,《震泽编》)他如江浙、湖广、广东、福建、江西、山东等地商人的活动区域也十分广阔。有不少商人的经营活动,甚至打入国际市场,“随着倭患的平定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明朝于隆庆年间正式开放海禁,并准许私人出海贸易。此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交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sup>[29]</sup>这表现为海外贸易额不断扩大和从事海外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多,“今之通番者,十倍于昔矣。”<sup>[30]</sup>(卷上,《才略》)充分说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比前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人口分布与城镇的发展。在明代,人口密度不同的地区,其城市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江南,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和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人口渐增,日益繁华。如杭州“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今(万历时)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sup>[31]</sup>(卷19,《风俗》)又如南京“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万历时)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稍稍官道以为麇肆,此亦必然之势也。”<sup>[16]</sup>(卷3,《地部》)二是市镇迅速发展。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按照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也属于城市,<sup>[32]</sup>李伯重称之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sup>[33]</sup>嘉、万年间,这种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江南地区,五里一市、十里一镇的现象,比比皆有。江苏吴江县,弘治时为三市四镇,嘉靖时则增为十市四镇,到万历时又增为十市七镇。茅坤描述浙江市镇昌盛的情况时说:“至于市镇,如我之湖(指湖州府),归安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将,所环小者人烟数千,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矣。”<sup>[34]</sup>(卷2,《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决事宜疏》)据一些学者研究,明代苏、松、杭、嘉、湖、常六府之地,约为36245平方公里,共有市镇339个,平均每106.9174平方公里有一市镇。<sup>[9]</sup>(P343)

市镇的人口不断增加,如吴江的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到了明末,居民已至二三千家。<sup>[35]</sup>(卷4,《镇市村》)吴江的另一大镇黎里,经过明代前期100余年发展,至“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sup>[36]</sup>(卷4,《风俗》)到了嘉靖年间,“居民二千余家”,<sup>[37]</sup>(卷28)人口比成弘之时又多了一倍。湖州府所属乌青镇,嘉靖年间“市井数盈于万户”,至万历时则是“居民殆万家”。<sup>[38]</sup>(卷5)秀水县所属濮院镇,万历年间“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新塍镇“居者可万余家”。<sup>[38]</sup>(卷3)乌程县所属南浔镇,嘉靖时已是“烟火万家”。<sup>[40]</sup>(卷2)崇德县所属石门镇“可数千余家”。<sup>[41]</sup>(卷3)另外像吴江的盛泽、平望、同里镇,常熟的福山、梅李、支塘、沙头许多市镇,都是在明中叶以后兴盛起来的。据李伯重的估计,除去苏、杭、宁三城市外,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总水平,明代后期已达9%,足见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发展之迅速。而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则远没有这么高。明末人比较杭州和北方城市说:“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威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sup>[42]</sup>(《浙江》)不仅南北不同,就连人口密度不同的浙东和浙西某些地方也差别甚大。浙西正德时已是“所在聚而为市,布缕菽粟以相贸易,权衡试以相计较,喧呶上下之声,昼夜不绝。”而浙东的慈溪县到万历年间仍是“县中市集,以四八为期,各乡鸡豚……盐鱼之属依期群集,稍有热闹,余日则若丘墟。”<sup>[43]</sup>陕西的韩城,更是“五谷财货无所售”。<sup>[42]</sup>(《陕西》)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既是人口再分布的过程,也是人口再分布的结果,体现了人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第四,人口分布的变化使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改变。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密度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增加和社会分工扩大的可能性提高,从而使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日益松弛。农民不仅可以从事更多的产业,甚至能够离开土地,投身于其它部门。明代后期,江南广大农村地区除粮食种植外,几乎家家户户兼营其它副业。张履祥在《补农书》中指出,明末嘉兴一带农村的个体户,“男治田地可十亩,女蚕养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棉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sup>[44]</sup>(卷下)松江农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sup>[19]</sup>(卷696,《松江府部》)除了这种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外,嘉靖以后弃农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也大大增加,“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sup>[45]</sup>(卷4)这里虽然有夸张不实的成份,但离开土地、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人数是不少的。在其他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一些府县中,也出现了农民“多去本就末”、“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的趋势。据嘉靖《通许县志》记载,通许县民“工十之二,商十之三,医、巫、僧、道、阴阳、卜筮十之一。”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或受雇做工,或从事商业经营,还有的成

为富室的家人奴婢。

由于劳动力充足,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内部,分工亦越来越细,“为农者,或田而稼,或圃而蔬,或园而果,或野而牧,或植木棉,或种蓝草,或给春磨,或操版筑,或卖佣工,或涂占盖,或穿窬窖,或采樵,或渔猎,以食其力”。<sup>[46]</sup>(卷1,《风土类》)手工业中“有攻木之工,有攻皮之工,有染工,有陶工,有缝衣絮衣之工。又有麦帽、麻鞋、线履、柳斗、波(簾)箕、织布、结网、熬糖、编苇席、织箔之工。其攻金石者,则间有之”。<sup>[46]</sup>(卷1,《风土类》)以上所举,仅是河南开封府所属尉氏一县的行业分工情况,就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言,劳动分工之细则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另外,随着一些地区人口增多和雇佣关系的不断发展,许多地或无地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分有长工、短工、闲工、忙工等。如苏州吴江,“计岁而受直者,曰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曰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曰忙工。”<sup>[37]</sup>(卷13,《风俗》)松江府,“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月暂佣者曰忙工”。<sup>[47]</sup>(卷4,《风俗》)嘉兴府秀水县,“四月望至七月望日,谓之忙工,富农情佣耕,或长工或短工。”<sup>[39]</sup>(卷1,《风俗》)湖州府一带,“无恒产者雇倩受直,抑心弹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sup>[48]</sup>(卷3,《菘城文献》)一些手工业部门的雇工人数达到了相当多的程度,如苏州的印染业和丝绸业,至万历时,“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sup>[49]</sup>(卷361)在明代中后期,一个城市中的某种手工行业的雇工人数能达到数千人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口分布和劳动力流向的变化情况。

第五,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局部地区人口过剩、资源紧张。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不断提高,许多地区人口已经相当稠密,甚至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弘治年间已有人注意到福建兴化府“生齿日繁,田畴有限”,<sup>[50]</sup>(卷2)至嘉靖年间这种状况更加突出。泉州府“且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置网。”<sup>[51]</sup>(卷3)太湖流域,人口压力不断显现并日渐沉重起来。徐渭在论及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人口与土地时说:“夫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sup>[52]</sup>(卷18,《户口记》)可见这时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土地承载能力的一倍。地处南直隶南部的徽州府所属之地均是如此,致使许多人弃农经商,走上业贾他乡之路,“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sup>[53]</sup>(P41)歙县、休宁之地“歙休两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sup>[53]</sup>(P46)“徽州富甲江南,然人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sup>[53]</sup>(P51)休宁由于人口繁多,土地狭小,生产资源不足以供,遂致“民则聚于有余,而财则争于不足”,因而筹措部分资金“以贾四方”。<sup>[54]</sup>(《重修休宁县志序》)婺源则“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是以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西,本难悉数”。<sup>[53]</sup>(P53)与徽州府相比,北方的晋省亦有不少地方与之相像,呈地狭人稠之势。史载:“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sup>[55]</sup>(卷2,《生计》)明人张四维谈到山西情形时亦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sup>[56]</sup>(卷2,《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万历时更为严重,“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sup>[1]</sup>(卷4)从人均拥有土地量来看,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苏州府与全国相比,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为4.19亩,全国为14.05亩,是全国的30%;弘治十五年苏州府为7.58亩,全国为11.69亩,是全国的65%;万历六年苏州府为4.62亩,全国为11.56亩,是全国的40%。<sup>[57]</sup>正因为人均占有土地量少,遂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明中期以后,向苏、松、杭、嘉、湖五府之地输送粮食的现象愈来愈多,粮源主要来自湖广。如苏州枫桥镇,因其地当南北交通枢纽,水陆交通便捷,成为当时重要的屯粮之地,“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sup>[58]</sup>(卷19,《乡都》)湖广商人“向有自船自本,贩米苏买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国用。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sup>[59]</sup>(P389)造成粮食不足固然有大量土地改种经济作物的因素,但人口增长迅速也是重要的一点。

### 三

明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至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朝代,达到了相当繁盛的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进行调整,区域化的经济分工与协作业已形成,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嘉万时期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sup>[60]</sup>粮食、丝绸、棉花、油料作物、茶叶等商品的网络化交易已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在这些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缓慢地瓦解着。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不少地方的经济相对落后或极其落后,处在勉强维持生计或难于维持生计的状态。明代又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人口数量达到了此前历代官方文献记载中的最高额,即成化十五年的71850132口。<sup>[61]</sup>(卷198)尽管这一数字与实际人口数量有很大差距,并且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数字的质疑,但还是为了解明前期人口数量的上下波动和明代人口的数量规模提供了重要参考。明代的人口数量呈不规则的上下浮动,明代的人口分布呈不均衡的横向流动,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由于人口增长和人口分布的作用,在一些地区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在生产中可以投

人更多的劳动人手,精耕细作,进行集约化经营。明代江南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各种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开发利用,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成为明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因而顾炎武言道:“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sup>[21]</sup>(卷 23,《江南十一》)时人赵用贤亦说:“臣考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松常此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sup>[14]</sup>(卷 397,《议平江南粮役疏》)另外,无论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无论从事手工业生产还是进行商业贩运,行业性分工和生产工序性分工愈来愈细,使劳动力的投入量发生变化,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在另一些地区,由于受到人口稀少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中劳动力投入不足,无法实施精耕细作,遂呈现出粗放式经营。

其次,部分社会劳动力向商品经济领域转移,加速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手工行业的独立发展,商业的日益繁荣等,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力投入。在明代,这种投入得以实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形成。

第三,人口分布与城镇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口密集地区,大批人口不断进入城镇,既消化了农村剩余人口,又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城镇是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和生活中心,人口集中,对各种商品物资的需求量远远大于农村,因而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在对各类商品消费量不断扩大的刺激下,城镇的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有些成为手工业专业化生产中心,有些成为商品集散地或转贩中心,工商业在该地区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愈益加重,推动了明代城市化的进程。在人口稀疏地区,城镇发展则明显落后于人口密集地区,除自然因素和地理因素外,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口数量,无法保证城镇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而制约了这些地区城镇的发展。

第四,就人口中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而言,由于人口分布的变化导致一些地区人口流动加速,再加上商品经济的作用,使许多世代务农者一部分转而从事工商业,增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一部分则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在全国各地城市中均普遍存在,尤其是江南地区,规模更大,人数更多。例如苏州,进入劳动力市场者至少有数万人,“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直”。<sup>[22]</sup>(卷 16,《物产》)当时还有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织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他们为得到工作,“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sup>[23]</sup>(卷 21,《风俗》)表明当时的职业化分工更细,雇佣性劳动更加明显,成为市场经济形成的要素之一。

第五,由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样,明代人口发展和分布亦呈现不均衡特征,有些地方人口密集,有些地方人口稀疏,造成对各种资源和生产资料分配使用上的不均衡。再加上人为因素如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对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的霸占,使一些地区人民无法得到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造成人口过剩,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作用亦不相同。概括地讲,在某一时期、某些地区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的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另外一些地区则起到了消极的、阻碍的作用。历史是条割不断的长河,通过历史的分析,可为我们今天科学合理地调整人口布局、趋利避害提供借鉴。

## 参考文献:

- [1] 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王炎.双溪类稿[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 [3]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M].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22.
- [4] 吴应箕.楼山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6] 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7] 王维德.林屋民风[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8] 谢肇淛.西吴枝乘[M].续说鄂本.
- [9]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10] 嘉兴府志[Z].弘治刊本.
- [11] 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2] 徐光启.农政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3] 杭州府志[Z].万历刻本;乌程县志[Z].崇祯刻本.
- [14]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 [16] 谢肇淛.五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17] 钟化民.钟忠襄公贲豫纪略[M].丛书集成初编本.
- [18]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19] 古今图书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 [20]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Z].四部丛刊本.
- [22] 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3]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M].四部丛刊本.
- [24] 唐甄.潜书[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
- [25] 乌青镇志[Z].民国刊本.
- [26] 休宁县志[Z].康熙刊本.
- [27] 李梦阳.空同集[M].万历刻本.
- [28] 王鏊.震泽编[M].天津图书馆藏明刻本.
- [29] 张民服.郑和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J].郑州大学学报,1995(2).
- [30] 丁元荐.西山日记[M].济南:齐鲁书社,1955.

- [31] 杭州府志[Z].万历刊本.
- [32]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33]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J].清史研究,2002,(2).
- [34] 茅坤.茅鹿门先生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35] 震泽县志[Z].乾隆刻本.
- [36] 黎里志[Z].嘉庆刊本.
- [37] 吴江县志[Z].嘉靖刻本.
- [38] 湖州府志[Z].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乌青镇志[Z].万历刻本.
- [39] 秀水县志[Z].万历刻本.
- [40] 南浔镇志[Z].南林丛刊本,1936.
- [41] 崇德县志[Z].万历刻本.
- [42] 顾炎武.肇域志[M].四部丛刊本.
- [43] 许大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M].北京:三联书店,1957.
- [44] 张履祥.补农书[M].昭代丛书本.
- [4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Z].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6] 尉氏县志[Z].嘉靖刊本.
- [47] 松江府志[Z].正德刻本.
- [48] 湖州府志[Z].乾隆刻本.
- [49] 明神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
- [50] 仙溪志[Z].弘治刊本.
- [51] 泉州府志[Z].万历刊本.
- [52] 徐渭.青藤书屋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3] 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Z].合肥:黄山书社,1985.
- [54] 休宁县志[Z].万历刊本.
- [55] 五台新志[Z].光绪刊本.
- [56] 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5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58] 苏州府志[Z].乾隆刻本.
- [59]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60] 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
- [61] 明宪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
- [62] 元和县志[Z].乾隆刊本.
- [63] 苏州府志[Z].康熙刊本.

责任编辑:王 剑

## Influenc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ocial Economy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 Min - fu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unbalanced examined from regions, and it experienced some changes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ndi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both ac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that embodi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social economy,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towns, changes of labor and vocational structure, overpopulation in some areas and lack of resources.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ocial economy